

從葡萄牙看孫中山及中華民國之創立一種政治及外交論述

薩安東*

正如中國共和起義的同時代人湯姆遜寫到的那樣，“1911年10月的偉大革命從天而降”¹。繼孫中山的同盟會於1907至1908年間在東京不成功的嘗試後，是在廣東重新開始了武裝鬥爭，1910年2月，策動了全省軍隊叛亂，但以失敗告終，同樣，3月由同盟會的傑出成員汪精衛在北京進行的一次對攝政王的謀殺也受到了挫折。1911年4月，作為一種物力和人力的孤注一擲，同盟會決定再啓孫中山1895年的計劃，即攻打在廣州的中心的張鳴岐總督衙門。當時和現在一樣，在眾人眼中，總督衙門充滿了象徵意義，正如謝諾指出的那樣，“廣東總督衙門為一古老中國真正的巴士底獄。它是滿漢高官豪華的宅邸，省稅收和官僚的神經中樞，帝國軍隊的軍營，判決嚴厲震懾眾人的法院，犯人很少再次重見天日的監獄。”²

然而，一些不可預知的情況使得帝國軍隊擊退此次攻擊並斬首了72名同盟會精英。儘管遭受了巨大的打擊，革命黨人不會放棄武裝鬥

* 里斯本技術大學政治暨社會科學系東方學院教授。

1. J.S.湯姆遜：《中國革命化》，倫敦，無出版日期，第3頁。我們無意在此對中華民國的事件及初期做一歷史回顧，筆者僅僅涉及一些經典著作，如徐中約：《現代中國》，第3版，紐約-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83年；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倫敦紐約，諾頓出版社，1991年；雷金納德·F.約翰斯頓：《紫禁城的黃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第7版，1990年；J.S.湯姆遜：《中國革命化》，倫敦，無出版日期；謝諾：《孫中山》，複雜出版社，1982年；陳志讓：《袁世凱》，第2版，斯坦福大學加利福尼亞，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2年；陳劉潔貞：《中國，英國與香港1895-1945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第121種；路康樂：《中國的共和革命。以廣東為例1895-1913年》，劍橋馬薩諸塞州，哈佛大學出版社，1973年；斯特林·西格雷夫：《龍夫人·中國最後一位皇后生平與傳奇》，紐約，1992年；齊錫生：《中國的軍閥系統：1916-1928年》，華盛頓，美國大學社會制度研究中心，1969年2月；以及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年》，斯坦福大學加利福尼亞，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6年。
2. 謝諾：《孫中山》，複雜出版社，1982年，第77頁。

爭。在攻打廣州總督衙門失敗數月後，10月10日，在當地駐軍的支持下，在湖廣總督衙門的總部及滿族在長江南岸的重鎮武昌爆發了起義。由於一系列偶然的情況和經過17年行動的挫敗，革命黨人終於第一次成為了華中重鎮的主人。當時它擁有控制華中這個最重要的製造業區分的軍事與後勤力量。分崩離析和普遍不滿的狀況使得大部分華中和華南帝國駐軍參加了武昌起義的行列，因此即於10月20日成立了臨時共和政府。歸功於人民的一場起義和帝國軍隊及管理的瓦解，上海也加入了進來。繼之，通過省議會知名人士的和平運動，湖南也揭竿而起。隨後，廣東省議會推舉孫中山的一老戰友胡漢民掌控了一個臨時政府。因此，在1911年10月下旬，令帝國政府感到恐怖和吃驚的是，中國三分之二的地方已經公開支持共和。12月2日南京的淪陷最後鞏固了革命政權。

值得強調的是，粵省的革命活動在整個創建共和過程中所起到的促進作用。正當孫中山前往西方尋求支持時，在廣東成立了同盟會，繼續推動一系列反清活動。事實上，廣州這個南方的大都市是反清的中心之地。這裡的任何恢復中華、反清的活動將得到秘密會社的支持和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廣泛階層的援助。百年來，在這個對外開放、經濟繁榮和文化先進的城市中，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日益強大。在孫中山離開期間，廣東的革命者胡漢民一直在鬥爭的第一線。葡萄牙駐廣州領事這樣寫道：“他不止一次地證明了自己的英雄氣概和千錘百煉的愛國主義。他參加了兩次恐怖和危險甚高的攻擊：一是攻打北京故宮，二是襲擊廣州總督衙門。他出任首領的政黨成員來自於富裕家庭，在國外讀過書，不像他們的領袖那樣無所畏懼，為了理想將性命置之度外……”³

1911年9月，兩廣總督被迫監視，後來關閉了新開通的廣九鐵路。它變成了一條重要的武器走私路線。一個月後，即8月2日（共和起義的定期），大批粵人如潮水般地湧入香港和澳門避難。光是澳門便創下天文數字的約萬人！⁴同月，在北京，鑑於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

3. 請見1911年11月16日葡萄牙駐廣州領事公函，附於1911年11月17日廣州領事致外交部公函內，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4. 請見若昂·格德斯：《憲法實驗室》，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1995年，第123頁。

端方拒絕出面調停廣東事態——他認為“無政府主義汎濫”——慶親王建議攝政王派遣一個強有力的滿族人物鳳山，立即任命他為廣州將軍。然而，最令人擔憂的是危機即將爆發的跡象是，當鳳山於10月25日上午在廣州的天字（水師公所）碼頭登陸，坐著轎子，在200名士兵護送下，前往總督衙門準備接受官印時，被一枚硝酸甘油炸彈引爆所暗殺。⁵

儘管迅速向外國外交官們保證說，公眾秩序不會改變，而他們對幾天後將發動的最後起義的種種傳聞置若罔聞。出於謹慎的考慮，26日那天，8艘外國砲艇開進了廣州港，其中英國、法國、美國和日本各兩艘。27日，在葡萄牙領事的要求下並與在澳門總督的同意下，“澳門號”砲艦快艇也駛向廣州港。按照宋次生的說法，此舉的目的是為了強調葡萄牙的存在，“為了讓華人得知，葡萄牙也有在華利益要捍衛與保護。”⁶

風聲越來越緊，謠言越傳越烈。這些謠言——稍後領事解釋到——是革命黨人傳播的，目的是為了“給普羅大眾以‘獨立精神’的啓迪，但到了一定的時候，為滿清的力量所摧毀。他們堅定不移，對漢人的刻骨仇恨一覽無遺，而漢人則用武力來動搖滿清的刑銬。一切可以預言：在忠於帝國的部隊和那些加入了革命黨人陣營的人之間的交戰中，那些作好準備，擁有火藥工廠和彈藥庫的人會佔優勢，而後者缺少武器彈藥，一開始便被剝奪了戰鬥所需之物。”⁷

然而，帝國軍隊在長江流域的連續敗北，由廣州出逃到澳門和香港而造成的貿易中斷，及匪幫在西江三角洲的浩劫，這些都是革命黨人的加緊努力的結果及“不知不覺之中，造成並加劇的喪志情緒是造成帝國部隊的頑強”⁸崩潰的因素。

5. 事件的描寫請見1911年11月17日廣州領事致外交部公函，附於廣州領事致外交部公函內，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及請見J.S.湯姆遜，前引書，第5頁。

6. 請見1911年10月28日廣州領事致澳門總督公函，附於1911年11月17日廣州領事致外交部公函內，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7. 請見1911年11月廣州領事致北京公使館公函，附於1911年11月17日廣州領事致外交部公函內，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8. 同上，同頁。10月28日，領事寫到：“肯定的是，革命黨人要比廣州裁縫成功，昨天和今天他們忙著在縫製共和的旗幟。傳聞說，兩廣總督偏向於贊成革命黨人，因此在

11月9日，革命黨人將軍胡漢民宣佈廣東省獨立，受中華民國軍政府管轄。宋次生領事在致里斯本的電文中，向外交部部長報告說：“廣東剛剛宣佈和平獨立，懸掛起了共和旗幟。”⁹

面對一系列的事件，葡萄牙領事毫不迴避地在給澳門總督的信函中強調說，“廣東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的獨立引起了普遍的驚訝，更令人驚訝的是它那巧妙進行的方式。”¹⁰後來宋次生回憶說，這也許是因為總督張鳴岐的緣故。“當時他受到死亡的威脅。他設身處地感覺到全國上下反對清朝奴役的情緒是多麼的普遍，已經無能為力。他試圖說服有關各方避免流血，讓大家明白他願意接受任何可以避免生命犧牲和國際麻煩的安排。粵省眾官之長的這番宣言更加助長了革命黨人的士氣，令保皇黨更加沮喪。革命黨人的領袖為粵省的富人。他們認識到，取得勝利的最好辦法是通過金錢。他們試圖通過金錢回報來買得滿清軍隊的同意。總督很快認識到，他正在失去他任封疆大吏的省份政府的主要支撐——公安力量。他對革命黨人的領袖說，他將向他們中代表多數人意見的當選者交出官印。”¹¹

作出這番聲明後，總督實施一與英國領事精心策劃的出逃計劃。直到他在香港總督府中安頓下來後，世人才得知這一計劃。避難前，張鳴岐身著華式簡陋便服，在載他去英國殖民地的船上，對領袖領事發表了一番聲明：

“……為了維持和平與和諧，廣東省議會，七十二行公會，九個慈善機構和總商聯合會要求廣東省獨立。本人，粵督，鑒於民衆對獨

收到勒令投降的命令時，回答說，他不能拱手相讓，言外之意是，最好由革命黨人來證明治安力量無能力鎮壓任何叛亂。這樣便產生了明天政治集會的想法，其主要目的是說服滿清軍隊投降，以便後來要求總督交出全省的行政”，請見1911年10月28日廣州領事致澳門總督公函，附於1911年11月17日廣州領事致外交部公函內，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9. 1911年11月9日領事致外交部電報，引自於1911年11月17日公函，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10. 請見1911年11月16日葡萄牙駐廣州領事公函，附於1911年11月17日廣州領事致外交部公函內，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11. 請見1911年11月11日廣州領事致北京公使館公函，附於1911年11月17日廣州領事致外交部公函內，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立的普遍同情，授權他們宣佈獨立，在廣東全省建立民選的政府。省議會為其行政機關。所有涉及外國列強的事宜將繼續由廣東政府經辦……”¹²

帝國在廣東統治的命運就這樣劃上了句號，兩廣總督這一不光彩的統治形式終於結束了。張鳴岐的出逃自然引發了政府的崩潰和對國家財政的掠奪：“當地官員，如布政使、鹽監、警察監、州官、副州官及縣令瞬息間逃離了廣州城。”¹³

此時，革命黨人的部隊迅速向廣東會和，兩廣總督將已經很脆弱的權力韁繩受託於水師提督李准。他在失敗的攻打總督衙門中，失去一條腿攻。可沒有餘下什麼權利了。胡漢民將接受投降，談定直到立法議會的選舉舉行前，在廣州設立一個軍政府總部，管轄已經被革命事業贏得的南方省份。

1911年11月10日晨，在一片“喝彩與炮竹聲”中，新都督凱旋進入了廣州，陪同的有由副都督陳炯明將軍和汪精衛。在日後的中國歷史二十載中，他們注定要發揮了突出的作用。胡漢民重申了前幾天的話。11日，他有意給廣州領袖領事發了一份安撫的通知，重申說從9日起，“……我對所有列強的外國人及他們在廣東省的財產進行完全保護。中華民國軍政府在湖北與友好列強的交易一併辦理。”¹⁴

隨後葡萄牙領事以生輝的筆觸評論道，儘管有革命黨人的一切保證，“駐廣州的領事們，如英國、法國和日本的領事擁有一群高薪、運作好的間諜，但他們至今未能得出結論，換言之，如果廣東的獨立糟糕或保持堅挺而帶來廣大廣東省人民的滿意……”¹⁵於是，就在11日當天，由於已經預感到此種態度還將持續相當一段時間，領事團決定

12. 請見1911年11月9日兩廣總督給波賀勞先生的批示，附於1911年11月17日廣州領事致外交部公函內，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13. 請見1911年11月廣州領事致北京公使館公函，de11.1911年11月，附於1911年11月17日廣州領事致外交部公函內，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14. 請見1911年11月10日兩廣總督給領袖領事波賀勞先生的批示，附於1911年11月17日廣州領事致外交部公函內，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15. 請見1911年11月16日葡萄牙駐廣州領事公函，附於1911年11月17日廣州領事致外交部公函內，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在未得各個公使館的指令之前，不對新政府予以承認。¹⁶在葡萄牙的情況下（根據葡萄牙駐北京公使館14日第二封電報），意味著必須同地方當局發生官方關係的情況下，領事館應該按照英國領事傑彌遜這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家的做法而行，這樣它將繼續發揮葡萄牙澳門地方當局與廣東政府之間關係協調人的寶貴作用。

與香港一樣，在廣州宣佈成立共和在葡萄牙引起了一陣喜悅，因為兩國的政權變化很相似，自然超出了華人社團，波及到了葡萄牙人社團。葡萄牙的一位陸軍軍官，J.A.費爾南德斯稍後幾年回憶說，他曾“作為熱情的觀眾，看到過這一將舊滿清王朝掃地出門的起義，可建立的共和國現在幾乎死於袁世凱之手。我看到過——也許只有一種很高的公民意識才會引發的自發性——公眾自願認購，以支付革命的費用。從百萬富翁到貧窮如洗的苦力大都解囊，將他們的積蓄慷慨地放到陌生人的手上。我目睹了人們大義凜然地剪去傳統的辮子（這個革命推翻的以前的王朝強加的）。在我們和平的澳門，我目睹了這一切，理髮師倍增。我見到了大部分漢人這一激動人心的儀式，在貿易、工業及錢莊銀號方面都有舉行，大家都公開、鄭重地做好了剪辮的準備。去掉後，好像歐洲人一般，以這種場合必喝的香檳酒舉杯慶祝……幾天中，我看到商店裏的歐洲商品一搶而空，印度商人的一切銷罄，從多年來一直沒有買主的漂亮靴子到可憐的華人所穿的有些歐化女里女氣的外套。我看到，拋棄了漂亮的絲綢長衫。這些華麗，色彩斑斕的長衫被優雅地脫下了，與優雅的而實用的作輯打躬形成了某種和諧。我目睹了這一切。起義的興奮狂熱，似乎所有人為進步之善神那神秘的魔術棒所擊中……”¹⁷

但粵省的革命，除了他所提出的激動人心的政治，甚至是意識形態的考量外，也給澳門政府和輿論帶來了許多重大且令人擔心的考慮，因為，儘管開始一片燦爛，胡漢民的地區政府從一開始就遇到了兩個為華南共和的初年蒙上了一層陰影的嚴重的問題：新政權時刻面

16. 請見1911年11月11日廣州領事致北京公使館公函，附於1911年11月17日廣州領事致外交部公函內，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17. J.A.費爾南德斯：《中國的一個政治階段（華人心理學研究小探）》，波爾圖，馬里奧·雷登印刷所，1916年，第3-4頁。

臨的金融匱乏及廣東政府無力控制約14萬民衆。這些人是海盜和秘密社團的成員。開始利用他們取得了粵省。他們最終住進了廣州，要求政府給予他們認為有權利享有的金錢報酬和部分權力。在這些事件發生僅僅5年之後，一位葡萄牙軍官，J.A.費爾南德斯寫到：“……海盜是共和革命勝利諸因素之一。利用在全國迷茫的混亂，一大批在其他地方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罪犯、流浪漢及乞丐結幫成伙，在一些將起義視為一種大膽方式，幾乎肯定可以發財、做官的大膽者的率領下，將他們的勇敢獻身於那些為了神聖事業而戰的人……考慮到平和的華人對海盜聞風喪膽，它對起義的最後勝利的分量可想而知。”¹⁸ “鮮為人知的是，共和成立後，兩廣總督派遣了一艘軍艦到澳門，表示慰問，讓一個我們試圖在圍攻路環中逮捕的海盜頭子當他的副手”¹⁹ 土生葡人飛南第在孫中山遭受迫害時，救過他的命。在寫於1912年1月11日的信中，他向新總統表示了祝賀，但也沒有錯過機會提請他注意一個事實，即“有必要立即採取措施以制止和防止廣州的這些私人頭目的活火行為。他們聲稱在招募共和黨士兵，因為他們已經造成了局勢的混亂……”²⁰

在胡漢民入城後不幾天，葡萄牙駐廣州領事憂心忡忡地指出：“如今在臺上的革命黨請求主要的強盜團伙入夥，因為以前的政府無能力消滅它。入夥有兩個條件：之一，若與帝國軍隊作戰，須向團伙支付一百萬圓澳門幣；之二，要是沒有流血取勝，將海盜編入政府軍的行列。短短三天中，廣州市為約25,000人佔領。都是些海盜和行為可疑的人。他們個個裝備精良，都是些習慣於生活在生命不斷遭到威脅的人。目前的政府不僅僅將接受邀請的海盜編入了隊伍，還要安插他們介紹過來的人”。²¹

18. J.A.費爾南德斯，前引書，第11-12頁。

19. 同上，第12頁。即居住在路環的大名鼎鼎的梁玉華（譯音：Leong Ngai Va）。關於此人物及此種人物的政治活動與“海盜”之間細微的分界綫，請見若昂·格德斯，前引書，第121-122頁。

20. 同上，第144-145頁。

21. 請見1911年11月16日葡萄牙駐廣州領事公函，附於1911年11月17日廣州領事致外交部公函內，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這種情況，胡漢民發現自己無力解決。它會引發廣州主要華人商業和金融社團的無可救藥的恐慌，並成為了殖民政府的擔憂。這便是向澳門和香港大逃亡的起因。在這種心理狀態下，1月16日，總督馬植多致電殖民部，發出了對廣東省情況的警告：“無政府，為海盜團伙所控制。”他提請注意：“騷亂初期，在澳門聚集了大量華人”。情況被認為是“危險的”，原因是缺乏人手維持治安。這一事實使得總督要求部長從葡屬印度在最長20天內派來一個土著連，還要配備“一支快速組成的遠征軍，攜帶一門速射、輕便的山炮，兩個下級軍官，二十名士兵、火炮、兩支機槍步兵連。如果沒有可能，則派遣一艘軍艦來。”²²總督已經預期到了部裏的反應，他向部長保證說：“閣下可以堅信，絕無絲毫的誇張。這一請求是所有技術人員在深思熟慮、多方協商、審慎評估情況後作出的。如果不能夠盡快派來所請求的援軍，尤其是印度士兵，我將不為殖民地的安全負責……”²³

雖然有葡萄牙駐倫敦公使曼努埃爾·特謝拉·戈麥斯的情報，葡萄牙外交部得到的信息與英國外交部的情報相左。它未涉及“海盜在廣州的任何活動。城市在革命黨人手中，繼續有證據說明尊重生命，財產和外國人的權利”²⁴實際情況是，根據葡萄牙駐廣州領事的直接觀察，“內行人的意見是，在短短三個月後，這個政府將無法供養治安力量。大部分由最糟糕的那種犯罪分子組成，可現在的公共治安委託給了他們。另外一些匪幫未被邀請，因此，未編入官軍的行列。他們利用混亂搶劫周邊省份，搶奪個人武器和彈藥，草菅鄉村紳士，肆意搶劫。這種無政府的狀態需要新政府維持一支薪金優厚、能夠制服今天擾亂全省安寧的匪幫的治安部隊。此外，對這個新政府沒有什麼可期望的。它缺乏有經驗和精明的管理人員，無足夠的資金來支撐這樣一支如此巨大的治安力量，可全省的安寧皆有賴於它……”²⁵

22. 1911年11月16日澳門總督致殖民部電報，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23. 同上，同頁。

24. 1911年11月21日倫敦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25. “由於老的‘預支軍餉’不誘人，也不足以滿足那些花慣了的人的貪婪（如那些強盜），此次‘預支軍餉’提高到高每月6至10澳門元，再加補貼6澳門元用於伙食費，每個列兵每月共計16澳門元。如果以前的政府，在取消賭博壟斷後，已經掙扎在維護治安力量（其軍餉和數量相對較小）的嚴峻困難中的話，本屆政府如何才能維持這一

在這種情況下，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無論是在澳門還是在香港都對殖民地的內部安全憂心忡忡。人們越來越心存疑問，有可能從廣州出發來攻打本澳。但是，宋次生領事堅信，“一般的看法是，無論是革命黨人還是海盜都將盡一切努力不要製造國際糾紛，因為他們認識到，保護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有益於保持他們堅定的理想。在此情況下，不要害怕會侵佔香港或澳門。很自然的是，他們寧願保存這兩個殖民地，以便一但雙方交惡，好有個避難之地。因此，華人湧入澳門應該以和平與有益方式進行。”²⁶

葡萄牙領事還在公函中報告了當天他同傑彌遜之間的“私人與機密性質的”會晤。英國領事在這個問題上“一言九鼎”。他的意見是華人永遠不會攻擊澳門，除非他們受到了挑釁要他們這樣做。因而，他認為澳門政府若要採取任何預防措施，應該不做“任何張揚，不讓華人察覺到我們在做對付突發情況的準備”。上策是：“表面上對進入本澳的外地華人寬宏大量，善待之，使他們能體會到我們的熱情好客多麼有益，還要彬彬有禮，使得他們潛移默化地認識到，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在外國比在自己家鄉更有保障。”²⁷

因此，不變歷史的周而復始。澳門再次向所有逃避大陸的政治和社會動盪人們敞開了大門。他們或是安居澳門或是轉道香港。²⁸

這一切事件均發生在孫中山在美國逗留期間。出於其影響及革命黨創始人的盛名，孫中山被推選進共和運動的領導層。他於12月25日回到了中國。口袋裡帶著他巧妙外交活動的初期成果：不再禁止他進入英國領土，帝國政府和英國之間關於新貸款的談判破裂，日本停止支持北京政權。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是，國際銀行財團主席許諾，在革命政府獲得列強的承認後，將開始與革命政府的代表談判。

新的負擔？”，請見1911年11月16日澳門總督致殖民部電報，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26. 同上，同頁。

27. 同上，同頁。

28. 1911年11月4日北京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在北京，葡萄牙臨時代辦恩里克·奧康納·馬爾丁斯已經承認非常困難“預測動搖了舊中華帝國腐朽的政治制度基礎的政治革命的結局。尤其是此時，事件急轉直下，昨天還有希望的解決方案今天便消失了。”²⁹台上爭鬥的有兩種唯一的主流：主要的，這位葡萄牙外交官將其形容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兼有。引發了和領導的那些人乞靈於武力和暴力，主要目的是用來結束滿清王朝，甚至君主制本身。”³⁰其他人，他將他們定義為“改革派”。這個政黨不僅僅希望“一種自由憲政，在其庇護下，帝國可以進行必要的改革”。這樣，如果第一種主流“引發了整個華南的起義”，第二種主流僅僅“擁有其道德力量”。如果革命黨人想“對事物進行一種激進、徹底的改變，通過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方式變更中國”，改良派則“以至今為止接受的體制為依托，只希望根據現代需求對其進行改良。”雙方的動機是完全不同的：“一些人力求避免王朝的消亡，而另外一些人則要導致消亡……”³¹

12月29日，在省代表的幾乎一致的選舉投票下，孫中山當選為新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然而，位於南京的新政權面臨著國家統一的問題，因為北京繼續在位的是宣統童帝溥儀，醇親王為首的政府仍在運作。事實上，即便在孫中山當選後，清朝的最後一屆政府還是挺過了最近的政治動亂。它們標誌著滿族世代統治的分崩離析。首先是，陸軍大臣蔭昌鎮壓武昌起義軍不利，11月，水師提督薩鎮冰倒戈和令人沮喪的上海和平會議。帝國的代表唐紹儀利用它作為一種共和信仰的職業。³²尤其是10月至12月間，對袁世凱的行動進行了妥協。正是袁世凱的這些行動暫時幫助鞏固了殘餘的皇權，為它的最後命運打上了句號。

袁世凱被視為世紀之交中國政界最傑出的人物之一。他出生於中國北部湖南的一個古老的官僚家庭。他被視為李鴻章弟子和得力大

29. 同上，同頁。

30. 同上，同頁。

31. 關於這個與澳門歷史有密切聯繫的人物的叛逃，請見《紫禁城的黃昏》，第85-86頁上的重要敘述。

32. 請見1911年12月6日對醇親王免職的詔書附於1911年11月21日駐北京臨時代辦致外交部公函，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oPA12M20/21。

員，因1898年幫助摧毀了改良運動，領導了對山東義和團的鎮壓和最終創立了中國第一支現代化軍隊—北洋水師而名噪一時。事實上，在1905至1906年的軍隊改革方案後，袁世凱的聲名大振。這引起了朝廷的巨大猜疑。1909年，他已經幾乎默默無聞了。然而在1911年革命時，帝國政府很快認識到，有能力對付起義叛軍的部隊在忠於袁世凱的軍官指揮下。通過內閣及其首領，就是給袁世凱造成政治失利³³的醇親王辭職的代價，朝廷最終還是給了他一個全權的地位。這種信任可以使他重新效忠朝廷。效忠朝廷可在各處煙消雲散了。正如葡萄牙代辦從北京寫來的那樣，“朝廷現在所有的希望都在袁世凱身上。這是一位老皇后時代的重臣。作為政治家，輿論希望看到他出來安定局勢。在此情況下，如果袁世凱在諮政院（諮詢委員會）的支持下，想解決問題，而不犧牲王朝，也不流血，必須和平解決，與革命黨人達成某個協議。問題的解決不僅僅是取決於他那久經考驗的能力，而更重要的是革命黨人的意願，尤其是他們對此事的信任度。然而，不安的情緒在尚未爆發革命的城市中日益增長。上海火藥庫及楚望台軍械庫幾乎未遭抵抗便被革命黨人所奪取了。廣東宣佈為獨立共和國，長江流域以南的所有城市已經在革命家黨人的掌控之中。”³⁴

然而，袁世凱似乎已經產生有一天登上皇位的野心（曾數次歸因於他的恩師李鴻章）。袁世凱立即小心翼翼地開始了他的計劃：掌握了局勢後，他立即接近革命黨人。然後在12月1日，革命黨人向袁世凱保證說，君主一退位，共和國總統將交付給他執掌。³⁵孫中山的當選造成了談判的破裂。是孫中山本人安撫袁世凱保證說，只有確保他以後永遠擔任，他才接受臨時總統一職。孫中山這誘人的承諾及1912年1月3日中國駐外外交官團所採取的立場迫使宣統皇帝退位。這使得袁世凱最終決定公開通知南京革命政府，如果讓他當總統，清帝將自願退位。

33. 1911年11月4日北京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亦見1911年11月21日駐北京臨時代辦致外交部公函對這些事件的敘述，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34. 1912年2月14日北京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35. 請見J.S.湯姆遜，前引書，第85頁。

孫中山深知李鴻章的這位得力大員的為人，巧妙地把他栓上了導致帝國和平結束的主要交易，提出了權力交接的條件：由袁世凱將負責向外交使團宣佈清朝最後一位君主的退位，同時公開聲明他對共和的支持。接著，當孫中山接到外交使團關於清帝退位的通知，辭去臨時總統職務，由議會推選袁世凱，使這一職務空置。最後，袁世凱應宣誓效忠議會準備的憲法，在此之前，無軍權。

最後決定採取極端的一步，袁世凱將努力履行協議中他應該執行的那部分。利用軍隊的支持，他向反對滿清退位的諸侯施加壓力並借助年邁，但活躍的慶親王奕劻來說服朝廷，寧願失去一切來換取自動退位帶來的有利條件。袁世凱最終讓單獨正式監護一個5歲幼帝的皇太后做出必須做出的決定。

1912年2月1日，皇太后將袁世凱召入皇城，抽泣著向他宣佈說其餘問題由他考慮，唯一的要求是，維護皇帝的尊嚴和榮譽。1912年2月12日，中國25個朝代的最後一個和263年滿族的統治成為了歷史。袁世凱公佈了由他作為總理簽署的聖旨，正式宣佈宣統皇帝退位。

“13日晚前夕，葡萄牙臨時代辦寫到——預期已久的皇帝退位詔書公佈了。太后以幼帝的名義簽署了詔書，承認國家的大部分人傾向共和政府，因此，不會為了一個家族的榮耀，而無視千百萬人民的意願，決定將主權還民，採用憲政共和政體（原文：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義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太后說，以此滿足本國人民的願望。她已疲於無政府狀態，渴望看到恢復和平。她將步先賢的腳步，天下為公（原文：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同一詔書授予袁世凱全權組建共和臨時政府（原文：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但對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隻字不提，亦不承認它的存在。詔書只是說袁世凱將與共和軍取得一致（原文：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顯然是共和軍進行了革命，代表實力，但決不可忘記是，在南方存在一個有組織的民權，而新共和機器的全部運作取決於它，因此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上，南京昨天的一封

電報表示，詔書完全忽略了南京政府的影響很糟糕。擔心的是，關於成立臨時政府的談判會中斷……”³⁶

事實上，令孫中山大為不滿的是，袁世凱在最初由南京政府起早好的詔書中，偷偷加進了一份聲明，授權他組建臨時共和政府，與革命黨人洽談國家統一。在這歷史連續的特殊敏感時刻，袁世凱大筆一揮，讓他未來的總統的合法性不是基於南京政府，而是出於皇帝本人。而後，預期事件接二連三而至。12日當天，袁世凱宣佈支持共和國。13日，孫中山辭去臨時總統，建議袁世凱為繼任，14日，臨時議會選舉袁世凱擔任了以前由孫中山佔據這個位置。在再次戰勝了孫中山將首都遷到南京的意志後，袁世凱不太願意放棄一個他佔主導地位的北京。最終袁世凱如願以償，保留北京作為國都的地位並於孫中山宣佈中國的第一個臨時憲法的前一天，即1912年3月10日開始了他的執政。

儘管這些成就熠熠生輝，並不是所有事情都合袁世凱的意。在對中華民國的承認上，國際社會顯得很吝嗇。這一情況嚴懲了中國新政體，因為新共和國在外交方面欲取得的基本訴求之一便是盡快獲得列強的承認。而它們在1911至1912年之間多少有些靜靜地觀望，看著清朝的必然滅亡，選擇了嚴格的中立和減少可能的行動，警惕保護其在華國民和確保北京與海洋間的“走廊”。除了某些特殊的情況，如葡萄牙共和國對中國共和政體表示了不可否認和無私的同情，大部分列強主要以實際利益為主，即保護屆時在華投入的巨大投資。

意識到這一現實，孫中山立即認識不必要激起列強的敵意。他已經欠了他們許多，還盼望得到更多。1912年年底，仍在法國的他，在匆忙返回中國前夕，接受了某日報的採訪，表示有意在現有的條約基礎上，與所有的列強展開合作。後在1912年1月5日，在其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後一週，孫中山再次尋求安撫列強，向他們保證，所有與帝國政府在1911年10月13日以前簽署的條約將得到遵守，保證支付貸款和尊重租界和治外法權的特權³⁷。1月19日，新政權的外交部長汪精衛

36. 同上，第88頁。

37. 1912年3月13日北京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向所有列強發送了一個照會，要求承認共和國，“以避免災難性的空位期。”³⁸

但是，儘管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孫中山在此方面一直面臨著堅拒。在這種期待和兩位魅力領導人之間可能出現裂痕的情況下，列強的選擇很明確，他們願意看到，中國“強人”的桂冠落在袁世凱的身上。此人對在中國有利益的列強的外交機構有好感，比在革命或思想上不可靠的孫中山要好。或許他們希望袁世凱成為一個鐵腕人物，避免由帝國的消亡而帶來的解體。希望他成為一個保守、獨裁政府的掌門人，防止再發生如太平天國運動或義和團運動那樣的災禍。

儘管普遍偏向看好袁世凱，日本和西方列強，在中華民國的第一年內，還是對這位舊的帝國將軍持有懷疑，採取了不給與渴望的國際承認的態度。1912年3月，在彙報袁世凱的就職和臨時憲法的公佈時，葡萄牙臨時代辦向里斯本指出，駐北京外交使團一致決定不出席儀式“因為目前還沒有政府，列強尚未承認新憲法。”³⁹事實上，如果就在不幾天前，中國媒體還保證說，有袁世凱這樣著名人物擔任總統將導致多數列強對新政權的立即承認，可事實是，這並未發生。“實際情況是——這位葡萄牙外交官寫到——在北京的外國使團團長認為，有袁世凱出掌中國事務是一個外國人安全的保障，但是不管個人對袁世凱有什麼好感，對新政權承認的承諾不僅僅取決於外國使團團長們的善意，尤其是取決於各自的政府。各國政府將根據自己的利益來行事，並考慮到袁世凱或另外任何人在組成一個可以提供穩定，能夠在中國恢復和平與秩序的保證，及確保龐大的外國利益的實際結果……”⁴⁰。

這種情況將保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就在1912年7月9日，外交部部長陸徵祥，以其政府的名義向葡萄牙臨時代辦送交了一份照會，

38. 1912年2月28日同上北京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de28.1912年2月，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39. 附1912年7月16日北京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內照會，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40. 1912年7月16日北京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通知他獲任出任部長會議主席，再次表示將全力“保持和加強我們兩國之間更加緊密友好的關係”並表示“希望葡萄牙立即承認中華民國”。⁴¹然而，據這位葡萄牙外交官寫給里斯本的函件，“似乎列強要到合法選舉出總統後，才會承認新共和國。大部分省份所處的無政府狀態和無政治性質的部隊的不斷起義導致了屠殺與掠奪，預測不出何時舉行總統及議會選舉……”⁴²

未過多久，在政府某些成員的操縱下和由於缺乏自主行動的能力，共和國新總統的獨裁和霸氣顯露了出來。顯而易見的是，他努力把一個議會制共和國改變成一種使他將幾乎一切權力完全集中他的手中的總統制。正如葡萄牙臨時代辦神奇般預言的那樣：“儘管我們看到他迫於情況，做了些讓步，還是有點獨裁的性格。袁世凱將總統的職能視為政府首腦的職能，對共和制隱約有些了解，肯定反對一切分享權力的想法，盡一切可能來獨自掌管。而在南方黨內，各種人物逐漸匯聚首都，將竭盡全力反對袁世凱成為政府首腦的任何企圖。公開與否，一場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或是看到總統辭職，或是南京黨勝利，或是我們將目睹來自於一場革命，甚至是內戰的新災難。”⁴³

袁世凱巧妙地保持了孫中山和南方其他領導人的支持，這樣到了議會選舉的時刻。臨時憲法規定，政府成立半年後，要舉行議會選舉。投票結果顯示了國民黨的壓倒性勝利。這與袁世凱的利益分明是衝突的。這是因為現在在北京獲勝者的領袖是年輕的宋教仁。他極力倡導議會制。在袁世凱看來，他好煽動，會毫不猶豫地利用體制機制來反對總統的中央集權的意志。宋教仁在離開上海前往北京擔任國民黨領袖一職的當天被刺。這對袁世凱來說是合適的，可對廣大中國人民來講是一大醜聞。人們將事件歸咎於袁世凱。

袁世凱再次傷害了國民黨人的感情。他於1913年4月與五國銀團重新談判著名和備受爭議的“善後借款”，金額為25萬英鎊。儘管廣東

41. 1912年4月16日北京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42. 請見《中國，英國與香港1895-1945年》，第121頁。

43. 同上，第124-125頁。

商團，尤其是香港商團（已經充分地表現出對廣東省政府缺乏信任，認為它不稱職，無法解決長期的財政爛局）期待著北京的增援，以完成該貸款⁴⁴，但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發生了：孫中山敦促國會考慮拒絕這一違憲的活動。

袁世凱對國民黨的反應不期而至。6月9日，先是辭去了李烈鈞江西都督之職，其次，6月14至30日，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廣東都督胡漢民被免職。胡漢民的繼任為國民黨中的反對派陳炯明（他曾經在1911年底取代過胡在省政府的職務，隨後隨孫中山北伐）。他得到了中國新聞界的明確支持，回憶起他在革命後不久努力控制民衆，在出任廣東都督期間，推行了多項優良的行政和政治措施。⁴⁵

然而，7月12日，政府軍和李烈鈞之間的短暫交戰把後者趕下了江西都督職位，開始了所謂的“第二次革命”，其標誌是李烈鈞對中央政府獨立，繼之南京、上海、安徽、福建、湖南、四川也宣佈獨立。7月18日，廣東的陳炯明在出掌廣東省政府不到兩週的時間後，也無可奈何地宣佈了獨立。⁴⁶

廣東起義——在香港和澳門當局看來，是一個孫中山和胡漢民在英國殖民地謀劃的結果——開啓了該地區的社會、商業和金融極其不穩定的一個時期。這對袁世凱決定懲罰陳炯明很有用，而歐洲人認為，他是“被迫”加入反對總統的行列的。這個決定不難執行，因為缺乏軍隊的支持。他們的軍官——考慮到了政府軍的優勢和龍濟光的有效方法，龍濟光被任命為廣東宣撫使——開始重新效忠總統。

經過一番周折，8月初，陳炯明失去了對廣東省的控制，在廣州避難。繼激烈的街戰後，到處是死亡、破壞和掠奪。龍濟光結束了國民黨的優勢，出掌了廣東政府。這使得當地的歐洲當局如釋重負。這反映在駐廣州的英國領事傑彌遜的一番話中：“具有極其激進傾向並受過外國教育的年輕男子……一切都被取代了。他的離去對廣東省來講

44. 同上，第126頁。

45. 引自同上，第129頁。

46. 引自同上，第131頁。

是一件大好事。廣東省官員傾向於目前留在辦公室中，主要的高級職位仍由有能力或為帝國服務的人擔任。”⁴⁷

在有影響力的人物，如北京的朱邇典爵士、香港的梅合理爵士、領事傑爾遜和廣州的海關總稅務司梅樂的支持——當然也得到了澳門和廣州葡萄牙當局的輔助——龍濟光開始了一個儘管有暴力和全省治理頗具隨意性的政府時期，但給予了西方列強充分的保障，正如香港總督強調的那樣：“要不惜一切代價地維護秩序。”⁴⁸

鎮壓“第二次革命”所取得的成功促使袁世凱總統執行繼續加強總統權力的計劃。通過一系列的對議會的強加，這還是達到了目的，其結果是在最後憲法的起草期限前，最終定下了總統選舉的日期。

對於列強而言，他們對袁世凱的逐漸集權不能不算是有些滿意的。自1911年以來，他們對在華利益的命運擔心，因為它們幾乎所有都是以與帝國政府簽訂的協議為基礎的。即便如此，袁世凱也不會在這種場合得到列強的直接承認。遲遲不予承認是為了得到對中國國際承諾的正式保證。此種保障與共和的最終憲政實行不謀而合。這是在中國有利益的國家的共識，包括葡萄牙。雖然葡萄牙無租界或其他的大型商業投資，但還是在密切關注局勢，原因很簡單，如果不算1901年的北京條約，中葡關係的主要機制仍然是一個雙邊協議——1887年條約。它確定了對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的有史以來唯一稱呼的認可。

在這國際社會的普遍態度中，美國是個例外。它明顯地同情共和，特別是同情袁世凱。無論是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還是在傳教士舉辦的學校中培養的中國改良派人士都以青睞口吻將他介紹給美國公眾輿論。此外，正如史景遷所說，許多美國政治家認為，美國應該同中國保持一種“特殊關係”。它起源於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的終端所產生的傳統疏遠。它還表現在實施“門戶開放”政策的創新努力

47. 請見《追尋現代中國》，第283頁。

48. 關於美國支持承認中華民國運動的開始，請見一個積極活動者J.S.湯姆遜的見證，第30章，“對美國的興趣覺醒”，《中國革命化》，尤見第572頁起及《追尋現代中國》，第282-283頁。

中。⁴⁹難怪在1912年選舉後，獲勝的威爾遜總統不僅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合作夥伴處堅持實施在民主黨人競選中宣佈的承認政策。⁵⁰

在葡萄牙也是這樣。其駐華盛頓公使3月被美國方面要求轉達里斯本說，美國渴望在即將對中華民國承認中，得到葡萄牙的響應。葡萄牙政府，儘管願意馬上接受，但要推遲到得知了它在東方事務上最親密的盟友英國的意圖後，再做決定。⁵¹然而，這一態度並不能掩飾里斯本認為美國倡議十分不便，鑑於對直接涉及外國投資和特權方面的保證尚不充分。此外，人所共知的是，英國希望看到最終解決西藏自治問題（關於此點，袁世凱堅持傳統的態度，即將其視為一中國領地），日本在修建鐵路方面有期望，俄羅斯希望中國最後承認外蒙古的獨立。難怪葡萄牙被英國人拖入了一種明顯妥協的政策。當時英國外交的負責人愛德華格雷爵士在一份給葡萄牙政府的照會中時稱：“雖然國王陛下政府將仍然渴望得到對各項條約規定的權利、特權和豁免。以及英國公民享有的慣例的正式確認，但他們覺得，承認中華民國應該是有關所有列強一致的行動。因此，國王陛下的政府歡迎與葡萄牙政府盡早就以上幾點交換意見……”⁵²

基於此消息，葡萄牙駐倫敦臨時代辦佩德羅·德·托瓦爾提醒外交部，要注意此種信息交流的重要性：“特別是關於我們是否得到中國政府的某種承諾，將保持舊條約”。⁵³得到警報後，安東尼奧·馬希埃拉部長立即確認了葡萄牙政府與英國保持一致，聲明未從中國政府處獲得任何承諾和保持條約的信息。“這個問題對葡萄牙至關重要，我們沒有想到可以提出來！”⁵⁴

49. 1913年4月3日外交部致倫敦公使館電報，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50. 1913年4月14日愛德華·格雷爵士致佩德羅·德·托瓦爾公函，附於倫敦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de14.1913年4月，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51. 1913年4月14日倫敦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52. 1913年4月14日外交部致倫敦公使館電報，附於1913年4月17日倫敦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內，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53. 1913年4月17日外交部致倫敦公使館電報，附於1913年4月17日倫敦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內，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54. 1913年4月17日倫敦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在16日同英國外交部舉行的一次會議後，佩德羅·德·托瓦爾向里斯本回報說——不管巴西和美國將馬上承認中華民國——英國的承認最後取決於一個保持條約和尊重向外國公民授予特權和豁免的聲明，而它必須由一個常設政府，通過正式的承諾或沿用的慣例來做出，即“由一位即將由國民議會選舉產生的憲法總統選擇。”⁵⁵所期望的聲明的形式待商定：如果英國想（托瓦爾表示，這也是葡萄牙政府願意的）讓中國政府鄭重申明承諾承認以前的一切，日本則建議，通過一有條件的承認，即要求中國保證遵守“在舊制度下和革命時期，按照正式或習慣方式締結的一切的條約”的承諾。⁵⁶儘管墨西哥和美國於1913年5月2日承認了中華民國，接著，同月4日與5日，古巴和秘魯也予以了承認，但其他列強的立場保持未變。直到後來英國、日本和俄羅斯的利益得到了保證，情況才有了一個解決方案。9月30日，符德禮公使還參加了一個駐京外交使團的會議。根據日本的提案，會上決定，待正式通知選出總統後不久，中華民國將得到承認，“但作為一個必要條件是，總統在就職的同時，應作出一個正式和莊嚴的聲明，而這個聲明的文本是在此次會議上由各外交使團的團長認真討論、研究的”。⁵⁷在同一次會議上，同意由日本公使實地了解情況，即“私下、好像是主動”向總統府秘書長提交他們所希望的聲明的草稿。⁵⁸在10月4日的第二次會議上，日本公使向外交使團傳達了袁世凱接受了建議。為了大家的放心，中國外交部在選舉的當天，在宣佈當選總統姓名時，以機密照會的形式，發送到各外交使團一份10日總統聲明的抄件。定了這個日期作為國家元首就職典禮和宣誓典禮。⁵⁹

10月6日，國民議會舉行了選舉。如預期的那樣，袁世凱被選為中華民國總統。同日，葡萄牙公使在收到外交部部長孫寶琦對選舉和

55. 1913年10月7日北京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56. 1913年9月26日及10月7日北京公使館致外交部電報，附於1913年10月7日北京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內，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57. 同上，同頁。

58. 附於上述文件內。

59. 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瑞典、比利時、俄羅斯、荷蘭、奧地利、意大利和丹麥。

就職日期的正式通知後，如同其他11國的外交官那樣，以一照會回答說：“本人很高興地通知，葡萄牙共和國自今日起承認中華民國並與其政府建立正式關係”⁶⁰按照慣例，第二天，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袁世凱致電也是新近成立的葡萄牙共和國第一任總統曼努埃爾·德阿里亞加：

“總統先生，自從中國採取共和制度以來，得到了閣下貴國的熱烈支持。現在，國民議會選舉敝人為共和國總統，閣下政府及時通知我們予以正式承認。中國人民對此深表謝意。本人以所有同胞的名義，向閣下表示誠摯的感謝，並同時祝願我們兩國之間存在的友好關係進一步加強，並藉此機會祝福閣下和平幸福，長壽繁榮。”⁶¹

按照外交使團的計劃，孫寶琦提交的正式通知附有一該部長的秘密照會，事先知會了袁世凱就職儀式上講話中包括的聲明：

“外國列強對我們的態度一直是和平與公正的，每遇機會為我們提供了熱情的幫助。這毫無疑問要感謝世界文明，但我們高度讚賞友好列強的善意。非常重要的一是，我共和國每個公民明白地了解之並真誠地尋求鞏固國際友誼。為此，本人宣佈：將忠實地遵守所有清朝政府和臨時共和政府與外國政府簽訂的條約、公約和作出的其他承諾。所有以前的政府同外國公司與個人妥善簽署的合同將得到同樣的方式的嚴格遵守。最後，外國人在中國憑藉國際協定而享有的所有權利、特權和豁免權、法令，批准和慣例由此聲明確認。為了維護國際和平和友誼，特此聲明。”⁶²

60. 附於1913年10月7日北京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內文件，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61. 葡萄牙總統回答說：“我由衷地感謝閣下對本人當選的熱烈友好的話語及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對中華民國建立的極其熱情的祝福。本人請求閣下相信，我向您致以個人祝賀和衷心地祝願新共和國繁榮昌盛。今天您擔任了共和國的要職，本人以個人及葡萄牙政府和國家的名義表示祝賀。”分見1913年10月7日和9日電報，載“葡萄牙共和國總統和中華民國總統之間在承認中華民國之際交換電報的翻譯件”，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62. 附於1913年10月7日北京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內文件，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PA12M.20/21。

1913年10月10日，在故宮的一座大殿內，舉行了總統就職宣誓儀式。在長篇演講中，袁世凱加進了這一聲明。葡萄牙公使符德禮後回憶起外交使團如何依次受到了接見。每位團長在一番應景的賀詞後，逐一介紹了有關人員。“在隨後，他寫到——舉行的閱軍中，有18000人參加。人人裝備精良，操練的方式給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總統非常平易近人、友善。經歷如此之多的浴血奮戰，他的千秋大業碩果累累，不由感到心滿意足。除了些小小的可笑之處外，如使團長坐著“轎子”，他們的工作人員步行在周圍，一切都按照傳統的禮儀規則，組織得井井有條，……”⁶³

自然，中華民國承擔起了清朝簽訂的協議，儘管立即引發了關於許多條約“不平等”性質的討論。這樣，如果從一方面來講，葡萄牙在澳門存在的名義的確定，如同在1887年老里斯本條約所固定的得到了共和國的承認，從另一方面來看，對有關帝國政府遺留下來的界址問題完全由新政權重啓。儘管有分有合，直至1949年，從無意向改變之，恰恰相反，繼承了這些條款並延續了帝國主管部門的戰略，稍後則不斷否定葡萄牙對澳門土地和水域所聲稱擁有的權利。在可能的界址談判中，盡可能地採取一個強勢的立場，而帝國政府從來未表現出有要勘界的努力。

63. “在一些有疑問的地方與葡萄牙公使（符德禮曾擔任總統府禮賓長）進行了私人和秘密的協商，這樣葡萄牙共和國便建立了一個原則先例，即外交團的次序以該國的到達時間，而不是像一些人所主張的，以遞交全權證書的日期為準”，參見1913年10月13日北京公使館致外交部公函，藏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館，3^oPA12M.20/21。

